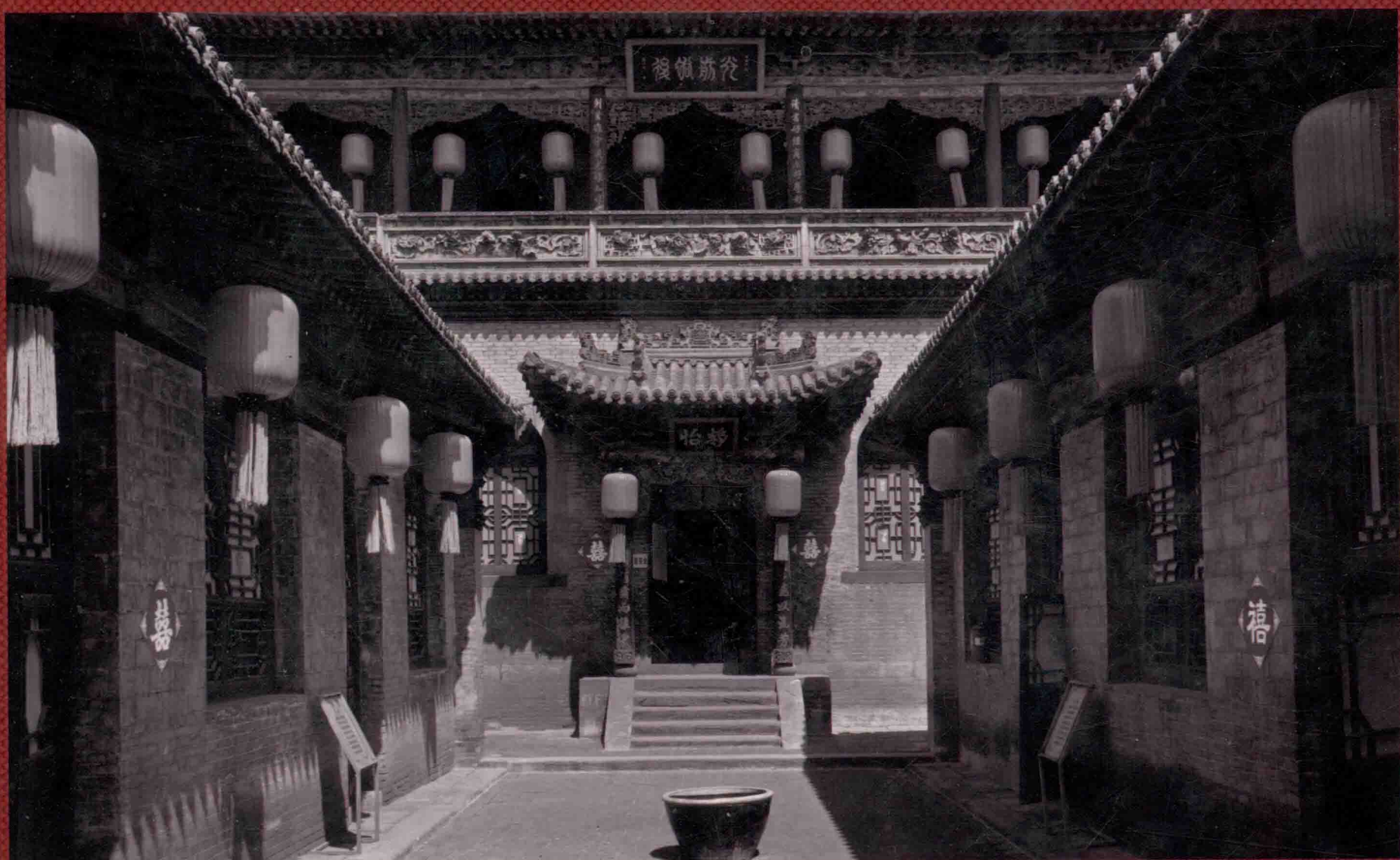


中国平遥古城与山西大院

Pingyao Ancient City and Shanxi Grand Courtyard of China

樊炎冰 编著

Fan Yan B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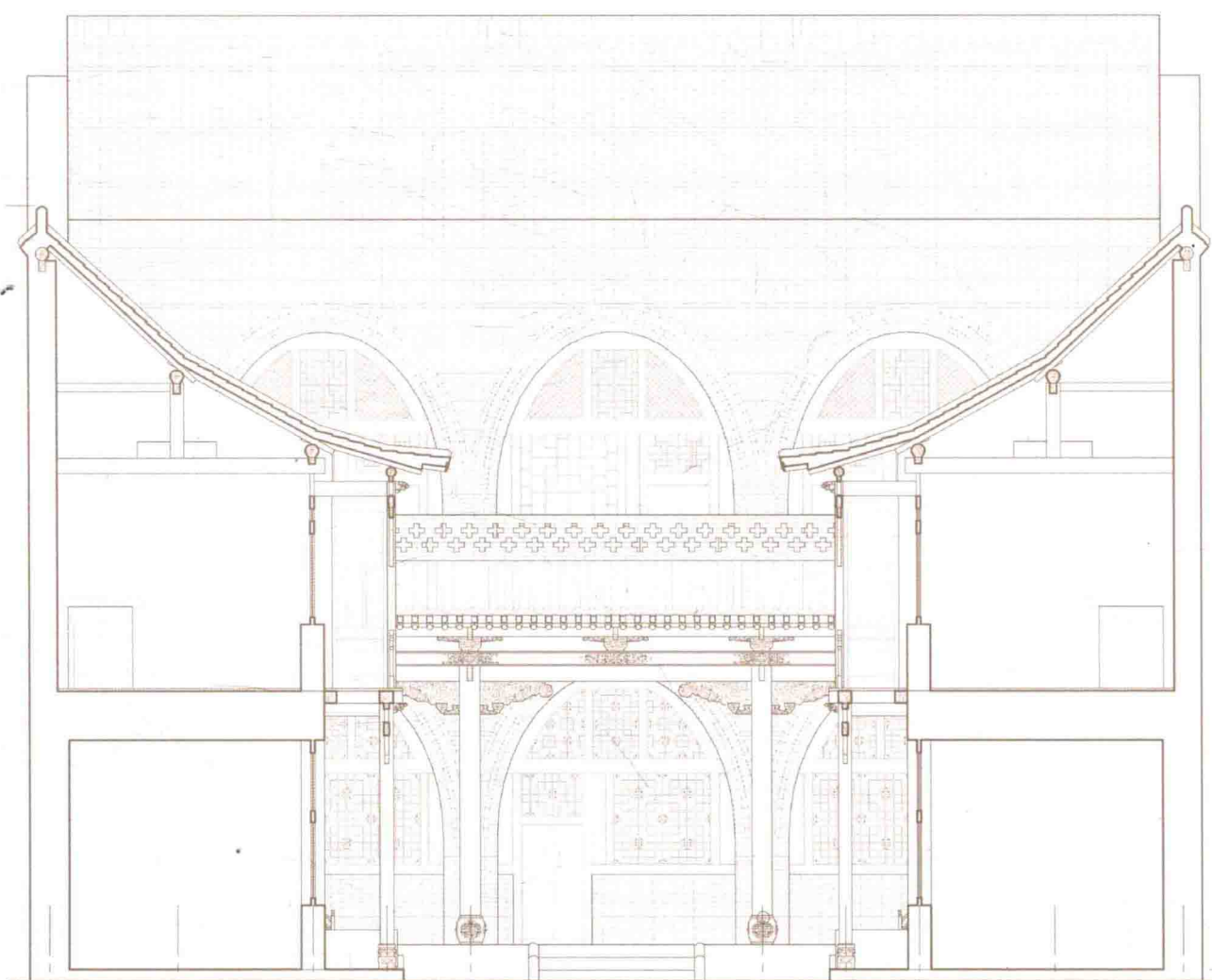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中国平遥古城与山西大院

Pingyao Ancient City and Shanxi Grand Courtyard of China

樊炎冰 编著

Fan Yan Bing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平遥古城与山西大院 / 樊炎冰编著.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5
ISBN 978-7-112-19465-0

I. ①中… II. ①樊… III. ①民居—介绍—山西省—
汉、英 IV. ①K928.7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13912 号

责任编辑：王雁宾 张振光 费海玲

书籍设计：肖晋兴

责任校对：李美娜 关 健

英文翻译：张本慎

中国平遥古城与山西大院

樊炎冰 编著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晋兴抒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制版
北京方嘉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965×1270 毫米 1/8 印张：48 字数：600 千字

2016 年 7 月第一版 2016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480.00 元

ISBN 978-7-112-19465-0
(28684)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晋商宅院的历史演绎	A Historical Deduction of the Residences of Shanxi (Jin) Merchants	1
平遥古城及衙府	Ancient City of Pingyao and Its Government Office	27
平遥古城及城墙	The City Wall of Pingyao	28
县衙（署）	Yamen of Pingyao County	46
票号	Piaohao (Draft Bank of Shanxi Merchants)	57
日升昌票号	Rishengchang Piaohao	60
蔚泰厚票号	Weitaihou Piaohao	70
蔚丰厚票号	Weifenghou Piaohao	80
天成亨票号	Tianchengheng Piaohao	90
汇源涌票号	Huiyuanyong Piaohao	96
协同庆票号	Xietongqing Piaohao	104
镖局	Biaojū (Firm of Armed Escorts)	125
华北第一镖局	North China No. 1 Biaojū	128
中国镖局	China Biaojū	134
同兴公镖局	Tong Xing Gong Biaojū	140
大院	Grand Residential Courtyards	151
常家大院	The Chang Family Grand Courtyard	154
皇城相府	The Prime Minister's Castle	190
王家大院	The Wang Family Grand Courtyard	248
乔家大院	The Qiao Family Grand Courtyard	306
曹家大院	The Cao Family Grand Courtyard	334
渠家大院	The Qu Family Grand Courtyard	358

晋商宅院的历史演绎

——张幼平

展开一张中国传统建筑地图，中国古代遗留下来的丰富多彩的伟大成就将让我们惊诧不已：巍峨壮丽、磅礴雄伟的皇家建筑，匠心独运、玲珑精致、赏心悦目的私家园林，而更多的星罗棋布全国各地的民居建筑，更是直接呈现了中国传统日常和乡土的生活世界。作为中国传统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民居建筑因各地区传统生活习俗、审美爱好以及自然条件、地理环境的不同而形成的民居平面布局、结构方式、造型装饰等方面的特色，以及分布广、数量多等特点而尤为引人赞叹，而以“北山西，南皖南”并称的晋商宅院和徽州民居更是以其卓著的成就谱写了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的华章。

山西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最早发源地之一，也是我国古建筑遗存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但论其最具特色的建筑门类，却非晋商宅院莫属。夸张一点说，把中国民居建筑作一个横向的对比，如果没有晋商宅院和大院文化的存在，山西民居也只是“泯然众人”而已矣！

考察晋商宅院无论如何都避不开晋商的历史，离不开那条绵延两万多公里、存在了 200 余年的茶叶之路。

1689 年 9 月 7 日（清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尼布楚（现俄罗斯涅尔琴斯克），在多年的争战之后，俄罗斯全权代表费耀多罗·戈洛文伯爵和清政府全权代表索额图、佟国纲终于在《尼布楚条约》上签下了各自的名字。远在京城的康熙大帝为此颇感兴奋，因为在完成国内的削藩平叛之后，中俄双方签订的这第一个边界条约终于让他感到可以“永敦睦谊”了。康熙帝想象不到的是，就在 150 余年后，他的子孙继承者们不得不在隆隆的枪炮声中，以战败者的姿态在更新的《璦琿条约》和《北京条约》上屈辱签字。

《尼布楚条约》第五款规定：自和约已定之日起，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来往，并许其贸易互市。中俄边境贸易之门由此打开。清雍正六年，中俄双方又签订《恰克图界约》，规定两国以尼布楚和恰克图（位于今俄罗斯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南部俄蒙边境）为常设边境贸易点，后又将中俄贸易统归恰克图。自此，原为边陲小镇的恰克图，逐步成为商贾云集、百货齐备的商埠重镇。

自明代开边以来，山西就因地势和政策之便，成为北方边贸的先行者，“走西口”的故事传唱多年以后，晋商已经深深扎根张家口、恰克图及蒙古各地，晋商贩卖的茶叶、丝绸、大黄、烟草、瓷



器以及手工艺品源源不断由此输往俄罗斯各地及欧洲各国，而俄罗斯的棉毛织品和牲畜也陆续由此进入中国。这条兴起于明清相交之际、通往欧洲的“茶叶之路”南起中国福建、浙江、江苏、湖北、湖南，北迄俄罗斯以及欧洲诸国，长达数万公里，是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陆地黄金通道。

在恰克图的众多山西商号中，经营历史最长、规模最大者，首推山西榆次车辋常家。据路履仁《外蒙古见闻纪略》载，恰克图“都是晋帮商号”，“买卖城（恰克图中国一侧的市场称‘买卖城’）由一条东西向的横街和三条南北向的巷子组成，西巷有常家的大泉玉，中巷有常家的大升玉，东巷有常家的独慎玉，经营的出口货以红茶、砖茶为大宗”。常氏祖先自明代弘治年间定居山西榆次车辋村，以农牧为业，兼营小商业，至八世常威因机缘巧合在张家口致富并开设布铺。雍正年间，常威父子创立“大德玉”商号，主营布类和日用杂货，之后拓展到药材和账庄。在中俄边贸开通之后，改大德玉商号为专营茶叶的茶庄，从事茶叶出口，兼营丝织品、瓷器、手工艺品，换回俄罗斯特产银锭、银器、牛、羊、皮毛、毛织品、玻璃器皿等，成为中俄茶叶之路上的晋商劲旅。常氏集团全面介入茶叶经营的各个环节，控制茶山和产业加工厂等各个环节。每到春茶吐芽之际，常氏就会赶赴武夷山，将茶叶以铅罐置于木箱，用马车自福建运到江西铅山河口，再通过船帮走水路，经鄱阳湖、长江至汉口，由汉水、襄樊转运至唐河，然后北上。在河南社旗的山陕会馆休息十余天后，再将茶叶驮运至洛阳，过黄河入山西，越祁县，出子洪口，于鲁村换畜力大车，经太原、大同将茶叶运抵张家口。此后，茶叶改用骆驼队驮运，经库伦抵恰克图，然后再转运至俄罗斯及欧洲各国。常氏集团在俄罗斯境内各地乃至欧洲其他国家都有自己的茶庄分号。

与常氏家族一样具有超人的商业嗅觉并抓住历史机遇，穿行在茶叶之路的，还有太谷曹家和祁县城里的渠氏。曹家始祖曹邦彦是太原晋祠花塔村人，以卖砂锅为生，明洪武年间举家迁移到太谷北洸村，兼以耕作。到十四世孙曹三喜时独闯关东，在东北的热河朝阳县以种菜、养猪、磨豆腐发家，逐步涉足酿酒、杂货、典当、粮食、银钱等行业，并独闯关东做买卖，获利甚丰，当时所谓“关外七厅”均有曹家的商号。清兵入关后，又把生意做到关内，先在太谷设号，向全国辐射。到道光、咸丰年间，达到鼎盛，大江南北都有曹家的铺面，达 640 余家，资产高达 1200 万两白银，雇员有 37000 人。后跨出国门，东到日本，北到莫斯科，西到巴黎、伦敦，把国内的茶叶、布匹输往国外，引进日本的钢铁、高丽的人参、俄罗斯的金属制品。渠氏先祖渠济原籍上党长子渠村，于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 年）在祁县城内定居下来，后开设店铺，创立字号。传至第十四世渠同海时，因为“走西口”而经商致富，故在包头买地开设了“长源厚”，经营菜园、粮食、油料、茶叶并兼营钱庄。渠同海之子继承父亲家业后，在其基础之上又开办了“长源川”和“长顺川”两大茶庄，经销于西北各地，并且出口到蒙古、俄罗斯以至欧洲大陆，获利至巨。其后世凭借贩卖食盐而使商业资本积累急剧膨胀，渠氏家族开办



的商号总数逾百座，金融票号分布于大江南北各大城市和全国各地水陆码头。

以常氏家族为代表的晋商经过不懈努力和奋斗为清代的中俄贸易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俄贸易鼎盛时期，茶叶之路上最多往返着数十万峰晋商驼帮的货运骆驼，荒野大漠上驼铃相闻，人声不绝于缕，十分壮观。据统计，当时的茶叶出口量占清朝对俄罗斯商品输出量的94%。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的统计数字显示，仅对俄输出茶叶一项，即高达约500万磅，按恰克图市价核算，中国商人的年收入可达500多万卢布，约合白银200余万两；道光十七至十九年（1837～1839年）平均输出茶叶807万磅，价值800多万卢布；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输出茶叶12万箱，价值可达1240万卢布。晋商在茶叶之路上获得了巨额的利润（当然也包括其他行业）。据徐珂《清稗类钞》载，在晋商已趋衰落的清光绪年间，据估计，介休、太古、祁县、榆次四县14家富商聚集的白银高达3000万两。考虑到晚清时期全国一年的财政总收入也不过在7000万～9000万两之间，称晋商之“富可敌国”绝非妄语。

二

在取得巨大的商业成就的同时，晋商开始在祖居地兴建家族大院。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和绵延不断的经商家世，经过200多年间的不断增补，晋商宅院形成了目前的规模，直接成就了山西建筑的伟大成就，并在中国传统中占有了不可或缺的地位。晋商宅院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文物价值，散布于山西全省各地，尤以晋中地区最为密集，其著者为灵石王家大院，祁县乔家大院、渠家大院，太古曹家大院，榆次常家大院。

（一）常家大院

常家大院位于晋中市榆次区东阳镇车辋村，始建于明末清初，清乾隆中期开始大规模扩建。庄园占地面积达60万平方米，共有房屋50余栋，各种房屋4000余间，还有7处连接各村的园林，呈现出园宅合一的形态。

常家分为“南常”、“北常”两支，“南常”万（玘）立“世荣堂”，“北常”万达立“世和堂”。南常世荣堂位于车辋村西南部，占地百余亩，以南北向的“前街”为主轴线，其大门坐西朝东，



大门内为石砌甬道，甬道尽头建照壁。其北侧依次布列 6 座院落，每座院落都包括内外两进。北常世和堂占地 200 余亩，总体平面布局近方形，以东堡门内长达 1 公里的東西向大街“后街”为主轴线，街道两侧为各堂号宅院，每个宅院的主体建筑都是雄浑方正的北方风格合院，分内外两进或内中外三进。外院临街为各式门楼，南房倒座临街，东西厢房三至五间，北房即为内院的倒座，中间有垂花门。内院平面呈方形，正北有高大的五间门楼，东西厢房各 8、9、10 间不等。现存各“和”字号院落，以“贵和堂”规模最为宏伟，气势最为雄浑，建筑最为考究，包括老宅正院、后院、偏院、东新院、西新院、小书院、车马院、客房院等 8 座既相互连通又各自独立的院落。北常各院落之间或后面，都建有花园或者菜园，园内花径曲折，甬道迂回，点缀亭台楼阁，奇花异卉。常家大院文化品位高雅，历史底蕴凝重，建筑集南北风格之大成，融院落园林于一体，堪称华夏民居瑰宝。

（二）渠家大院

同样行走在茶叶之路上的渠氏家族也开始于乾隆年间在祁县城里大兴土木，经过多次修葺和扩建，渠氏家族宅院形成了占地 3 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 23000 余平方米的规模，营建的宅第一度覆压了半个祁县城，人称“渠半城”。其中，代表性建筑渠仁甫宅院——人们通常称之为渠家大院，占地 5317 平方米，建筑面积 3271 平方米，内分 8 个大院、19 个小院、240 间房屋。

整座院落外观为城堡格局，高大的拱式大门洞上有玲珑精致的眺阁。石雕栏杆院是第一进院落，为待客之所，以随处可见的白玉石栏杆和上面栩栩如生的雕刻而著称。石雕栏杆院右侧为进深百余米的狭长五进式穿堂院，院落之间点缀方形门、月亮门、屏风式过厅等，呈现出层层递进的纵深感。十一踩斗拱牌楼院为主院，院内有一座设计精巧的木制牌楼，高十余米，檐下施十一踩斗拱；牌楼处于院落中部，主要是起分割过渡的作用，形成里院东、西厢房各五间，外院东、西厢房各三间的“里五外三”两进式穿心楼院格局。院落正房高约 20 余米，歇山顶，是当时祁县城内最高的建筑物，它与南房遥相呼应，形成南北长、东西窄的长方形院落，并在东西两侧设置偏院作横向拓展。主院前方就是包厢式戏台院，建筑以戏台为主，坐北朝南，面阔五间，明、次间大而两梢间小。东西厢房门面嵌有木制榻扇，将榻扇一除，便成为包厢看台。主院西侧有一条青砖甬道，将南北四个院落一分为二。北面为两个门房统楼院，与主院明楼院形成鲜明对照。南面为小四合院，小巧玲珑，曲径通幽。各个院落青石奠基，水磨青砖砌墙，院落之间以牌楼、过厅等多种形式过渡和分隔，各种雕刻工艺精湛，高雅美观，堪称民宅建筑艺术的佳作、中华文明的一颗民居瑰宝。



（三）乔家大院

同样出自祁县的另外一个晋商豪族乔氏家族却没有把其家族宅邸兴建于祁县城内，而是选择在了祖居地东观镇乔家堡村，这里距离祁县城东北约 12 公里。如果没有乔氏家族的兴起，这里原本只是默默无闻的乡村。

乔氏家族的创业始祖乔贵发于清乾隆初年单身“走西口”，在内蒙古萨拉齐厅老官营村立足，而后转至包头西脑包艰难创业，从开设草料铺、豆腐坊等起步，而后涉足银器打造行当，历经艰难曲折，将“复盛公”字号打造成了包头最大的商业集团，以至今天包头仍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说法。

乔家大院是清代全国著名的商业金融资本家乔致庸的宅第，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以后曾有多次增修、一次扩建，经过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于民国初年建成一座宏伟的建筑群体，并集中体现了我国清代北方民居的独特风格。大院为全封闭式的城堡式建筑群，现占地面积 10642 平方米，建筑面积 3870 平方米，分 6 个大院、20 个小院、313 间房屋。大院三面临街，不与周围民居相连。外围是封闭的砖墙，高 10 米有余，上层是女墙式的垛口，还有更楼、眺阁点缀其间，显得气势宏伟，威严高大。大院大门坐西朝东，上有高大的顶楼，中间城门洞式的门道，大门对面是砖雕百寿图照壁。大门以里，是一条长达 80 米的石铺甬道，甬道尽头，与大门遥遥相对的是庙堂式结构的祖先祠堂。甬道北面三座大院，从东往西数依次为老院、西北院、书房院，均为庑廊出檐大门，暗棂暗柱，三大开间，门外侧有拴马柱和上马石。所有院落都是正偏结构，正院主人居住，装修精美，高大气派，偏院则是客房佣人住室及灶房，较为低矮，房顶结构也大不相同：正院都为瓦房出檐，偏院则为方砖铺顶的平房，既表现了伦理上的尊卑有序，又显示了建筑上的层次感。大院有主楼四座，屋顶上有门楼、更楼、眺阁六座，各院房顶有走道相通，便于夜间巡更护院。综观全院，布局严谨，设计精巧，工艺精湛，充分显示了我国劳动人民高超的建筑工程水平，乔家大院被誉为“北方民居建筑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因此素有“皇家有故宫，民宅看乔家”之说。

（四）王家大院

被称为“中国民间紫禁城”的王家大院位于山西省灵石县静升镇。这座始建于明清时期的大院，由东宅院高家崖和西宅院红门堡，以及宜安院、孝义祠、当铺院、王家祠堂、戏台院、佣工院等组成，是晋中盆地诸大院中唯一依山而建的全封闭城堡式建筑群，共有院落 54 座，各种房屋 1052 间，总



面积约 15 万平方米，是目前国内现存规模最大的古代民居建筑。目前，向游人开放的红门堡、高家崖堡及王氏宗祠三组建筑群，尚不足王家大院总占地面积的 1/5。据载，属于静升王氏家族建筑群体的“五巷五堡五祠堂”，总面积就达 25 万平方米以上。

相较于晋商其他各家，静升王氏的发迹更多被当地人解读为风水的问题。王氏出身平民，先祖王实家境贫寒，后代耕读传家，兼营小本工商业，明末天启年间王家已经是“商者逐利湖海，据资千万”；明末清初，王氏族人开始经营典当，至清康熙年间，子孙以在冀、鲁等地贩卖牲畜致富，开始发迹，“誉髦接触、功名磊落者各代不乏”。迄乾隆年间，正式跻身官、商、农综合型的豪门望族之列，家世在灵石县境内成为家喻户晓。王家大院的完整形态正是伴随王家的发迹，历经数代百余年的持续建设而形成的。

在明清两代，山西省灵石县静升镇各种民居建筑已具有相当规模，至鼎盛时期，其聚落形态以横贯东西的五里长街为主轴，形成“九沟八堡十八巷”的建筑群。当年王家在修建红门堡、高家崖堡、西堡子、东南堡和下南堡五座堡群时，分别以“龙、凤、虎、龟、麟”五种灵瑞之象建造，以图迎合天机，即红门堡居中为“龙”，高家崖堡居东为“凤”，西堡子居西为“虎”，三者横卧高坡，一线排开，态势威壮，盛气十足。东南堡为“龟”，下南堡为“麟”，二者辟邪示祥，有稳家固业传世之寓意。

王家大院东宅院高家崖即“视履堡”，是一座不规则形封闭性城堡式串联建筑群，创建于清嘉庆年间，共有院落 35 座、各种房屋 342 间，建筑面积 19572 平方米。大院由三个大小不同的矩形院落组成，每个院落布局沿袭“前堂后寝”的传统风格。主体建筑是两座三进四合院——敦厚宅和凝瑞居，包括宽敞的正院及附属的偏院、套院、跨院、穿心院等，并有甬道、幽径、高墙、低栏等穿插其间；主体建筑东西两侧有两幢花园式庭院，北面高台上建有一长排 13 孔窑洞房，东北隅则是宽敞的场院，西侧门外面有书房院、佣工院、厨房、杂院等附属建筑。整个高家崖建筑群以正南居中的巍峨堡门为凤头，北部围院为凤尾，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为凤身，两侧的书院、花园院、长工院为双翼，比拟一只奋翅欲飞的凤凰，与红门堡建筑群一起寓意“龙凤呈祥”。

西宅院红门堡即恒贞堡，东西宽 103.8 米，南北长 177.8 米，占地约 1.85 万平方米。四周堡墙环峙，雉堞高耸，四隅建角亭。堡内主街南北向，长 128 米，宽 3.4 米，路面以大卵石铺就；东西方向，三条横巷各宽 3.3 米，长 90 米左右，与主街相交，路面墁砌青石板。堡内共有 28 座小院，房屋 834 间，由南北向的直街和东西向的横街分割成四排八处，其中隐隐显示出一个“王”字造型，又附会了龙的造型。堡内各院布局大同小异，多数为一正两厢二进院，北主南次，左右对称，其中绿门院较为富丽堂皇，而司马院最具传奇色彩。各院装饰既承继了明代建筑的朴实厚重，也沾染了清代建筑的华美俏丽。堡内还有兰桂园、隐翠园、红杏园、童心园等四座别出心裁的花园建筑。



王家大院建筑依山就势，规模宏大，结构严谨，气势磅礴，将北方建筑的雄浑与南方建筑的俏丽融为一体，气韵生动、意境悠远、格调高卓，是我国北方晋商宅院建筑群的杰出代表。

（五）曹家大院

极盛之时的曹家在北洸村相继建起了一批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布局严谨而富丽堂皇的深宅大院，如五桂堂、怀义堂、福善堂、三多堂等以“福”、“禄”、“寿”、“喜”字形建造的大院，同时还配套建有耕食斋院、车棚院、马厩院、客院、澡堂院、煤场院等十几处院落，目前幸存下来的“寿”字宅院，俗称“三多堂”，这是曹氏家族中的一个分支堂名，也就是多福、多寿、多男。

三多堂以高耸优雅、厚重古朴著称。宅院坐北朝南，南北长 98 米，东西宽 66 米，建筑面积 6348 平方米，总占地面积 10638 平方米，外观雄伟高大，形似城堡，独立村北，与四周低矮的民房形成鲜明的对照。宅院分南北两部分，东西并排三个穿堂大院，连接三座三层 17 米高的楼房，内套 15 个小院，现存房舍 277 间。三多堂东、南、北三面临街，北面是封闭的院墙。南面有两座拱券形大门，单檐歇山顶，进大门北行约 30 余米，即为东西向横陈的甬道，它将大院分成了南、北两部分。甬道南面的四合院分别为药铺、书房、账房院、客房院、厨房院、东门院、正门院、小戏台院、居宅院等，北面的院落包括三座东西并排、各自独立的穿堂院，南北两部分建筑完整构成外院内宅的形态。作为主体建筑，三座穿堂院平面布局均为两进四合院，由倒座楼、前院、过厅、后院、主楼及偏院构成，且后院正厅均建为堂楼，引领整个建筑群。楼顶还建有三个亭式重楼，飞阁凌空，是曹家护院家丁巡逻之地，也是主人举杯邀月之所。建筑造型酷似古代祭祀用的牛、羊、猪头像。当清晨雾气霏霏之时，或黄昏暮色茫茫之际，站在远处观赏，三座顶楼和整个建筑一起，酷似三头庞大的“牛”、“羊”、“猪”形，给宅院平添了几分辉煌和神秘。

三多堂秩序井然，分区明确，整座院落院中有院，院院相连，其造型之奇特和富丽堂皇以及雕工绘画艺术之精湛，都使其成为不可多得的近代民居建筑的珍品。



三

作为晋中地区的富商宅院，晋商大院因其地理环境、人文背景以及共同的文化意识而形成了一些共同的特色。

特点一，晋商宅院的建筑选址布局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建筑布局思想。

晋商大院的建筑选址，大多都是依其祖居之地，选择最佳的地方，因势利导而建。如静升镇背山面水，风景秀丽，古迹荟萃，王家大院巧借镇北黄土台地的自然地形和地势，利用地形的起伏与变化，依山就势，随形生变，达到了自然空间与建筑空间的融合与统一。红门堡和高家崖堡两大宅院建筑群东西隔沟对峙，一桥相连，相辅相成，层楼叠院，错落有致，浑然一体，气势恢宏。同样秉承择优而居观念的曹家大院，虽然并无地势之利，但仍以传统的营建思想为指导，因地制宜，通过对村落周围宏观环境的改造及宅院的巧妙营造，将这里变成了一块景观胜地，独立村北的三多堂外观在周围低矮民居建筑中格外醒目。宅基地受限条件较多，就采用纵向或横向扩张的手法，形成多进院落或院落建筑群。无论哪种布局方式，都是因地制宜，因境而成，利用经济和技术手段补足用地条件的不足。

从布局上，晋商宅院基本上继承了我国西周时期形成的前堂后寝的庭院风格，各种建筑严格按照封建典章制度建造、布局，中轴正直，左右对称，层次分明，主体突出，充分体现了“尊卑有别”原则，程式化特征明显。一般以正房、厢房、倒座或大门等房屋组成四合院或三合院，成为家族最基本的居住单元；院落的构成要素，包括正房、厢房、倒座、过厅、中门、大门；主要建筑坐北朝南，尊长居处正屋，前院和内院间以中间院墙分割，各级院落的标高渐次递增，凸显后进正房的高度和气势；正房结构为抬梁式木构，开间 320 ~ 380 厘米，进深 500 ~ 700 厘米，内部大多贯通。多数宅院中间建有砖木牌楼或过厅，将左右厢房分隔成里院、中院、外院，号称“里五外三隔牌楼”，或“三进三出隔过厅”。户院与户院之间的布局也是精巧有序。如乔家大院由五个分户院落和一个花园组成，大院北部两院一园，每户院落均为三进五连环套院，布局严谨，大院的南部也是由三个很有规律的两进双套院构成。有些院落虽然受到地势的限制，但也尽可能形成规则布局。受传统儒家学说和礼制要求，晋商宅院追求一种秩序井然的格局，大院分区明确、内外有别的空间序列，形成了一种符合封建礼制的居住环境。

特点二，晋商宅院外形上的高墙深院特色，打上了深深的时代与文化烙印，同时也体现了与自然的结合。



晋商大院给人的直接观感就是高耸而冷峻的城墙，几个著名的大院无一例外都采取了城堡式的格局，有的还在高高的城堡上点缀防御特征明显的垛口、马道。乔家大院外围封闭砖墙高达 10 余米，女墙式垛口，更楼、眺阁点缀其间，整体气势宏伟，威严高大。渠家大院外观为城堡格局，围墙亦高达 10 余米，垛口式女儿墙，高大的拱式大门洞上有玲珑精致的眺阁。围墙内的宅院绝大部分都是以高高的实墙或者建筑侧、背面墙体围起来的，尤为突出的是后墙高出屋顶很多，而且只往院内倾斜，对外的墙头直接就是正房的正脊。这一方面是防止盗贼进入，另一方面同时也限制了院内女眷的视线。这种建筑形式在彰显身份和地位的同时，也体现了强烈的文化保守意识和防范观念。

晋商宅院往往采用狭长的平面布局。院落往往是窄窄的，长长的，不少院落的宽只有两三米，而进深却可达十余米。晋中地区属温带寒冷半干旱区，夏季高温，白天日照充足，气温较高；冬季寒冷干燥，日照较短，气温较低。在夏天，早上太阳高度角较低的时候，东侧的院墙就可以遮挡阳光，到了正午太阳高度角最大的时候，狭长的院落格局阻挡了部分炽烈的阳光，而枝繁叶茂的植物正好可以遮住整个院落，带来家居的惬意与荫凉，傍晚的阳光也和早上一样；冬天的早上，太阳的高度角不高的时候，阳光也不够温暖，这时候高大厚实的围墙正好可以挡住室内的热气外流，而到了正午，落叶乔木则允许阳光直接温暖整个院子。

特点三，晋商大院整体形态外雄内秀，建筑整体威严宏大，细部华丽精巧，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审美特质。

在严肃冷峻的整体内部，晋商建筑无论是建筑装饰还是结构布局上都显出了自己的灵动和生活气息。建筑装饰依附于建筑主体，是建筑艺术表现的重要内容。在晋商宅院建筑中，无论大门入口还是过厅大堂，无论屋架山墙还是梁架柱枋，无论门窗楣扇还是檐板栏杆，只要条件允许，都充分运用传统石雕、木雕、砖雕及彩绘等工艺做法，结合当地技艺特色，或富丽堂皇，或简约素雅。遍布曹家大院的门窗、椽檐、阶石、栏杆、石刻、砖雕、木雕和彩绘，无不造型精巧，工艺精湛，富于寓意和文化内涵，具有很高的建筑美学和民俗研究价值。王家大院的木雕、石雕、砖雕，用瓶中月季寓意四季平安，喜鹊登梅喻喜上眉梢，一瓶清莲喻一品清廉，翠竹喻节气，苍松喻长寿，象征、隐喻、谐音等多种手法综合运用，创造了大量形象生动又有一定哲理寓意的建筑装饰艺术品，其构思很多都有文人士大夫的参与和书画艺术家的介入，同时还有美学家在理论上的指导，是为审美、使用、寓意相结合的典范作品。有的宅院内部还采用只有在南方庭院建筑中才能见到的石雕栏杆。晋商宅院并不刻意经营园林。中国历史上，北方地区历来以皇家园林为主，地方则以官邸建筑中的园林为主，私家园林并不多见。晋商宅院中的园林形式较为简单，多以果园、菜园为基础原型，巧妙布置，点缀一些简单的庭院建筑如亭、廊等，使建筑具有另外一种风情。如常家大院，昭余湖、



观稼阁、听雨轩等的出现，将其点缀成为一座拥有北方皇家园林恢宏大气特点的私家园林。

特点四，晋商宅院整体与细节都体现了商人的审美意识与特点。

在财富不断增长、自信心不断膨胀的过程中，晋商也并没有完全忘却创业的酸楚，守业的艰难。深受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封建时代统治阶级乃至普通百姓对商人都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明清时期随着商业的兴盛，人们的观念逐渐转变，商人不再自惭形秽，晋中商人更是领风气之先，认为“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经；是故必明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如此则子孙必昌，身安而家肥矣”。但商人们背井离乡，含辛茹苦，也因为文化教育的缺乏而有过酸楚的教训。如太古曹家大院的主人曹三喜在东北朝阳做生意的时候，与当地合伙人分财产，并把官司打到了官府，因为不识字，被向着本地人的官方把财产判走了一多半，干吃哑巴亏。因此，在致富之后，曹家非常注重读书，专设书塾，聘请名师，后代出了不少文人，曹家大院的雕饰中很多就是劝学的。在修建自己的宅院之时，许多商民也把这些成功和酸楚用书写、绘画和石刻等方式表达于建筑的装修之中。许多商贾大院的门枕石上都刻有书和相关的组合图案，意为“书香门第”，指望自己的后人好好读书，出人头地。出于商人对财富的热衷和追求，晋商宅院对民间有关聚敛财货的民俗禁忌非常重视，如房顶做成内向的单坡形式，将雨水排在院内，称“肥水不流外人田”；将门槛做得很高，用来阻挡“财气”外溢；院落或房屋的门均不能两两正对，防止冲了财气。闹市之中的渠家大院门内一连五进院落，五个门洞均不正对，就连院内的排水管路也不顺直，而是左右交替，曲曲弯弯，因为在当地，水被认为是钱财的象征，不能轻易溜走。晋商大院就是综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审美、地方民俗和宅院主人的具体审美趣味而形成的。

四

一座晋商宅院就是一部商业资本的发展史，一个家族悲欢离合的剧目。每座晋商宅院后面的故事都有着不同的讲述方式，但在共同或殊异的形态下面，它们都承载所在文化体系和地域方位的具体特点，传达了始创者和继承人的梦想、野心和其他一切。今天，人们读解大院的形态和结构，抚触每一处装饰，不仅仅是在欣赏一个美的建筑群体，更是在缅怀一种曾经辉煌却已然逝去或者余脉犹存的共同幻想。



作为家族聚居地，晋商宅院首先是晋商的家园。晋商宅院不是一些孤零零的院子的组合体，而是由众多院子紧密相连、前呼后拥组合成的大型家族院落群。这种家族宅院聚落形态，反映了晋商在长期的商业竞争环境中对同舟共济、群体合作精神的深刻认识，同时也更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传统的家族观念和居住文化精神中的家乡情结与观念。延续几千年的中华农业文明，让人民形成了对故土与生俱来的深厚感情，安土重迁成为一种内化精神，传统儒家文化的构造就是以家族为社会生活的中心，家庭生活被视为最基层的社会生活，居住文化精神以乡土为核心。为官者在退隐之后要衣锦还乡，在外地经商发财者要在家乡卜地置产，光宗耀祖。如曹家家族在东北起家，在和家乡联系并不紧密的情况下，曹家人还是选择了在太谷县北洸村而不是北京、天津等中国近代名城或者其他具有良好山川河湖的景观胜地。也许，在拼搏异乡的晋商们心头，曾经一步三回头的走西口经历作为集体的记忆，已经深深烙刻心底；千里之遥的故土甚至是已然陌生的乡村，虽然不是他们纵横驰骋的战场，但却是他们永远的精神家园；对于故乡的眷恋，不仅仅是对一方水土的无尽迷恋，对留居的妻儿老小的无尽思念，也不仅仅是对高墙大院安逸生活的向往，更有一种具有一定宗教色彩的终极皈依的心像。

剥除这种精神内核，首先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就是晋商对商业资本的自信。他们可以选择最佳的地点，可以把房子盖得更高更大，可以使房子盖得更加好看，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依托，晋商宅院最为明显的特点就是极其浓郁的商业文化特色。它们往往都是所处区域的标志性存在，无论规模、形制还是装饰等，都大大超过其附近区域的其他农业人群聚落住宅。晋商宅院大多都是一定区域内规模、形制、式样、装饰最具特色或最具品位的建筑要素的组合，同时也是跨聚落、跨地区、跨省份的民居建筑文化的交融空间。如从规模上看，灵石王家大院建筑规模达 15 万平方米，榆次常家大院占地 200 余亩，乔家大院号称小故宫，渠家大院占半个县城，曹家大院几乎占据了整个北洸村。空间构成上，每户院落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多个单元经过巧妙的空间组合形成大院，组合方式多种多样，多数都是几进院落组合而成，规模宏大。如祁县乔家大院的五院加一园，灵石静升王家大院的王字形，太谷北洸村曹家大院的并联的三座院落等，每个院内都套有众多小院。主要的晋商宅院都以巨大的规模和复杂的建筑构造成为所处区域的显著标志，但也有例外，如曹家三多堂由并列的三座大院组成，内套 15 个小院，共 280 间房间，但其奇特之处不在规模，也不在院落组织，而在于它的三串院落的“底景”——后院正方均为五丈余高的四层平顶楼房，顶层各设一座歇山式屋顶的小型阁楼，醒目而别致，点出了“三多”的主题。

在激烈的商业竞争环境下，院落规模宏大、外围堡墙高峙、内部装饰的宅院群代表了晋商的身份、实力和地位，也代表了晋商对合作伙伴和客户的承诺；不仅如此，这里还可以兼具居住和办公功能，



可以成为统领全国商号的总部，接纳来自各地的商业伙伴。当然，更多的还是争大比阔的心态，是为了满足个人或者家族的虚荣心。在实用性之外，商业资本的自信心一再彰显。构成对这种自信的限制是中国传统的礼制。中国素称“礼仪之邦”，礼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和行为的自然准则。建筑作为人类活动的产物，在其发展过程中长期受到“礼制”的影响，“礼”就像无形的网一样，也渗透到了乡村和城市建筑的每个角落，深受儒家文化濡染的晋商也把它视为了民居功能布局设计的指导思想 and 基本原则。与礼直接相关的是民居的形制等级。中国传统民居的建筑形制具有极强的等级识别性，具体表现为房屋等级、基座形式、面阔、屋顶形式，甚至在斗拱、彩画以及雕刻内容、色彩装饰、方位朝向等细微之处都有自己的规范，以建筑的形制的严整秩序适应国家的政治社会关系的秩序。晋商宅院严格遵行这种等级安排，“天地君亲师”各得其所，长辈住上屋，晚辈居厢房，女眷处内院，佣仆置偏处，各有安排。四合院中实际用于礼仪活动的面积，大大超过了用于起居生活的面积。主院落的用途也就是为了进行礼仪活动而设置的，院落常成为主人身份等级、社会地位的标志，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中国封建宗法社会所追求的等级门第观念。晋商宅院充分行使了社会赋予的建筑特权，厅堂五间八架，施斗拱和彩绘，突出了家庭的社会地位。在家族内部关系的处理上，以正房供祖先牌位，里院长辈居住，外院和偏院供晚辈和下人使用，充分体现出主人的价值观，反映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秩序以及以职位的高低定尊卑的社会原则。

在礼的束缚之下，商业资本也在寻求某种突破，这在古代就称之为逾制。中国传统建筑的等级制度非常严格，即使到了封建社会的末期，民间建筑也不能够随意越级。但晋商还是在巧运妙思，以各自的方式对这种逾制作出了不同的诠释。很多晋商宅院民居的性质和装饰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了传统建筑的等级制度。如王家大院西宅院红门堡内由南北向主街和东西向横街组成的王字形，以及东西宅之间的龙飞凤舞的构想，多多少少就有些逾制的嫌疑。厅堂是传统宅院中规格较高的建筑。明清时期，官府明确规定了厅堂不同结构等级的适用范围，如“一品、二品厅堂五间九架”，“庶民庐舍不逾三间五架，禁用斗拱、彩绘”。但太古曹家三多堂内宅中，形制等级最高的东、西院厅堂采用了五间九架和五间八架的结构形式；三座过厅均以灰色筒板瓦俯仰覆盖，檐口施勾头滴水，正脊作砖雕，梁、枋凡露明者均施彩绘，粗大的横梁上全部用金粉做底之后再施彩绘，内容为《红楼梦》人物故事。乔家大院北面的“里五外三穿心楼院”，里院的南北正房、东西厢房都是五间，院南面四号院的建筑吸收了许多官式建筑的特点，屋顶上有鸱吻、筒瓦、滴水、排山、神兽等，气势非凡，王家大院等也采取了同样的方式。

在这个方面，晋商并非没有惨痛的教训。平遥城里“日升昌”票号的掌柜侯殿元就因为建了一座“七间七檩”的房子而被官府缉拿，差点丢了性命，最后变卖房产买通官府才了事。因此，精明



的晋商也在寻求另外一个比较现实的解决方式，捐输官位或培养后人读书做官，建筑规格自然也可以相应提高。如乔家就多次用捐钱的办法，换来了二、三品官职的虚衔。因此，比较直接的方式就是在现有条件下寻求突破，在清代允许商民正堂建三间或五间的基础上，修建 2 层及 2 层以上的正堂，既可避免“僭越”又可增加体量，彰显财富与地位，于是晋商宅院中出现了楼高 2 至 4 层、体量高大雄浑的正堂建筑。这种极为巧妙的方式解决了资本冲动与等级制度之间的矛盾。

五

晋商宅院作为封闭严密的大院，或坚如关镇，或固若城堡，或俨然偌大县城，建设得宏大、厚重、古朴，烙上了社会动荡、治安紊乱的印痕。可栖居、可安乐、可防御、可固守的城堡式大院，有效隔绝了外界的入侵，成为晋商外出经略财富的一个个根据地和本营。高大坚固的外墙，阻绝了外界的入侵，也隔绝了与外界的联系，大院内与乱世互不碰撞的相对平静和安宁，使长期固守其内的主人不能真切地了解外面的世界。但这样的封建家族大院终究在历史的长河中消沉了。1840 年鸦片战争后，静升王氏走入了没落期，王家大院再也无法进行大规模的修缮和营造活动。不少王氏族人 不务正业，甚至变卖家产吸食鸦片，王家大院东堡院视履堡的主人因吸毒而家败人亡，在光绪十七年便将整座堡院以 946 两纹银典于田姓，子孙潦倒不堪，落得沿街乞讨；西王氏聚族而居的西堡院恒贞堡在将一家宅院卖与他姓之后，也不得不把“合堡同宗”匾额改成了“合堡同德”；奉旨修建的孝义祠和孝义坊也以 2000 吊铜钱卖出！在清末民初晋商败落之际，常家大院也开始败落；新中国成立后，常家大院被分配给村民、学校等使用，常家宅院长期处于半荒半废半民居状态，南常前街两侧建筑和北常后街南侧建筑基本不存，常家大院也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精致典雅的挑角牌楼、精雕细琢的影壁花墙、精美入神的木石砖雕等，为这座晋商豪宅增添了无穷的威严和气势，也显示了宅院主人的富有与地位。但曾经的辉煌也掩不住历史的风尘。

当裹挟着巨量资金的晋商们开始在三晋大地上精心构建自己的家园、为子孙后代留下栖身之地和充足财富之时，不可能预想家族的败落和大院的萧索；更不可能想象得到的是，在他们费尽心机留下的物质财富几近乌有之时，无形之中留下的文化和精神财富却更为富足，乃至成了后人富足的精神与物质文化的寻根点，寻求新财富的新起点——大院旅游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模式。